



西夏文物

西夏文物

史金波 白 滨 吴峰云 编著

文 物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赵铁华
装 帧 仇德虎
摄 影 张仲清等

西 夏 文 物

史金波 白滨 吴峰云 编

文物出版社 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新华彩印厂 印刷

建工出版社印刷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 × 1092 1/16开 印张：23·25 插页2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 - 5010 - 0049 - 2/K · 18

书号：11068 · 1694 定价：40元

前 言

公元十一世纪初，在我国西北部地区，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毗连的广大幅员上，出现了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国家政权——大夏王朝。因其在宋、辽之西，历史上一般称为西夏。

西夏王朝有国一百九十年，即自公元1038——1227年。如果从其“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远祖拓跋思恭所建夏州政权算起，他们到西北地区已历时三百四十七年，即自公元881——1227年。党项族为羌族的一支，亦称党项羌。原居地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一带，古称析支的地方。后来逐渐向周围扩张势力。南北朝末期（公元六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于历史记载。隋唐时期附属于中原王朝，并在中原王朝的协助下由原居地逐渐向东北方向迁徙，在沿途地区定居下来。夏州党项政权在政治上是中原王朝管辖下的节度使，经济生活上处于汉族封建社会的强大包围中，并深受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与影响，诸多因素最终促成了西夏封建国家的建立。

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完成了建国大业。他采用自己的年号，建都城，立官制，定兵制，改仪服，制礼乐，造文字，设蕃学，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西夏中期的仁宗仁孝时期，是西夏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时期。由于崇尚儒学与实行科举取士的结果，使党项贵族逐渐失去了崇尚骑射的武风，而日益沉湎于安逸侈靡之中，夏国自此走向了由盛而衰的道路。

西夏立国一百九十年中，共传十帝，至南平王昫，被蒙古所灭。西夏前期与北宋和辽，后期与南宋和金鼎足而立，视各国强弱为向背，纵横捭阖于一时，在祖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有声有色的历史篇章。

当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多次进攻西夏国土时，西夏文物典籍在刀光剑影中累遭损失。历经数百年的沧桑，连党项族本身也在历史的长河中

消逝了。昔日西夏文化的灿烂景象，只有从历史的陈迹中去寻找。

巍峨挺秀的承天寺塔耸立在宁夏银川市，是西夏首都兴庆府的象征。贺兰山麓的西夏皇陵，河西走廊中部张掖（甘州）的大佛寺，都曾以规模宏伟、气势壮丽著称于世。武威（凉州）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是保存完整的代表西夏文化特色的西夏文字碑刻。世界著名的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诸窟群的近百个洞窟中，保留着西夏时代的壁画、雕塑，供养人像与游人题记。本世纪初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了大批西夏时期的珍贵文书，这里是与敦煌藏经洞相类的又一个古代文献宝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在近十年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的文物考古工作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且取得了重要收获。如对宁夏银川贺兰山西夏皇陵的发掘；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及下西沟岷山洞西夏文物的发现；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西夏洞窟的调查；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夏黑水城遗址的再次发掘等，都有重要的发现与收获。此外，在北京、河北以及安徽、河南、陕西等省市都有西夏时期或西夏后裔活动的遗物、遗迹的发现。新的西夏文物的不断发现，充实了西夏文物的品类，一些精品问世，使其丰富多彩。更重要的是，由于西夏史籍几乎湮没不存，西夏文物的发现与调查，对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更加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从现有的西夏文物遗存来看，其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继承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继承性方面，在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国家内，还有众多的汉族，以及吐蕃、回鹘等族。党项族在深入汉族地区，并长期和汉族人民生活往来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汉文化，即唐宋文化的影响。逮至建国，其典章文物制度多采自宋朝。即所谓“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马，行中国法令。”西夏中期是西夏统治者提倡尊宠儒学最兴盛时期，也是西夏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时期。此外，西夏文化在继承吸收汉族封建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吐蕃与回鹘文化的成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

民族性方面，元昊建国在政治制度与文物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是以振奋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意识为宗旨的。最能代表西夏文化精神与特点的是西夏文字的创制，它对于形成、保存与发展西夏文化都起了

积极的作用。尤其使某些汉族的传统文化形式，诸如碑铭、官印、符牌、钱币以及文书典籍等赋予了民族色彩，达到了继承性与民族性的和谐统一。

由于年代久远，西夏经过了国亡族灭，文字记载十不存一，故其文物遗存，如果没有可靠的记载，是很难区分其归属的。如敦煌诸窟群西夏时代的洞窟与壁画艺术，过去就被五代与宋所湮没。由于西夏瓷窑与窖藏的发现，使我们对西夏瓷的特点有了一定的认识。所以说对西夏文物的了解与研究，现在还仅是初步的，工作也是十分艰巨的。我们正是在大量调查、搜集、整理，并作了初步研究的基础上着手编辑这本图录的。在本书中按其门类与资料的多寡大致分成八个部份：

一、建筑、遗址、陵墓。包括有城寨、宫殿、陵园、寺庙、遗址、建筑物等。

二、绘画。包括石窟与佛寺壁画、世俗供养像、绘画、木板画等。

三、金石。包括石刻碑铭、寺塔经幢、官印、符牌、钱币等。

四、铸造、雕刻品。包括金、银、铜器铸造品及石雕、泥塑、竹雕等工艺品。

五、木竹器、丝织品。包括木制器具、竹器，以及绫、绢等丝织、刺绣品。

六、陶瓷器。包括生活用陶瓷制品、建筑构件以及工艺品等。

七、世俗文献。包括西夏文辞书、官私文书，文学作品、法律著作、医书、历书、占卜辞及译自汉文的典籍。

八、佛教文献。包括译自汉、藏文字的佛教经典。元、明两代刊刻的西夏文佛经亦列入。

本书有四篇关于西夏文物的专题研究论文。其中关于西夏壁画艺术的文章是专门约请敦煌文物研究院刘玉权同志撰写的。

《西夏陵园建筑的特点》，对西夏贺兰山帝陵的布局、建筑与墓室结构特点作了介绍、阐述，并与唐宋帝陵进行比较。还探讨了西夏的丧葬制度。

《略论西夏壁画艺术》，以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为主，对西夏壁画的分期、题材、布局、技法等进行了探讨，论证了汉、吐蕃、回鹘等民族绘画艺术对西夏壁画艺术的影响。

《西夏官印、钱币、铜牌考》，介绍了前人对西夏官印、钱币、符牌的著录研究，并论述其铸造、使用、特点及其价值。

《西夏文文献新探》，对传世的西夏重要碑刻《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

的西夏文碑铭和部份西夏文佛经题款，作了重新校补译释。对《文海》、《音同》、《五音切韵》、《文海宝韵》等重要西夏文辞书的时代与版本进行了新的考证。

此外，在本书中还附有《党项迁徙图》、《西夏疆域图》、《党项、西夏帝王世系表》、《西夏大事、文物年表》及主要参考文献资料目录等，以供读者参考。

一九八六年五月

目 次

前 言	(1)
西夏陵园建筑的特点	吴峰云 (1)
略论西夏壁画艺术	刘玉权 (9)
西夏官印、钱币、铜牌考	白 滨 (20)
西夏文文献新探	史金波 (38)
图版目录	(53)
图 版	(61)
图版说明	(285)
党项、西夏帝王世系表	(337)
西夏大事、文物年表	(338)
参考文献资料目录	(351)
党项迁徙图	
西夏疆域图	
后 记	(355)
英文提要	(356)

西夏陵园建筑的特点

吴峰云

西夏陵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以西约40公里的贺兰山东麓。当地居民称之为“昊王坟”，以为墓塚林立的陵区，是西夏第一代开国皇帝嵬名元昊一人之墓。在他们中间还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元昊这个人很残暴，他做皇帝的时候，下令在夏国境内征调民夫数万，于贺兰山下为自己建造陵墓。但是，他又担心自己死后陵墓被盗，于是就决定让民工每天修一座墓，经过整整一年，建成三百六十座坟墓。陵墓修好以后，元昊就将所有参与修陵的人全都杀死。元昊死后，葬入了这三百六十座墓中的一座。因此，后人有去盗墓者，始终未能找到。这段故事虽属讹传，但也反映了“贺兰山下古塚稠，高下有如浮水沅”^①的壮观场面。

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通过长时间的调查和发掘，不仅发现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物，而且逐步摸清了陵园的分布和建筑情况，为我国考古学填补了一段空白。

史载：“景德元年秋七月，葬保吉（李继迁）于贺兰山。”^②“（天圣）九年十月，德明卒”，^③“葬于嘉陵，在贺兰山。”^④但是，都没有行帝王制度。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元昊令群臣奉册，谥祖保吉曰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妣野利氏曰顺成懿孝皇后。父德明曰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妣卫慕氏曰惠慈敦爱皇后。”^⑤在此之后，继迁与德明之墓才有可能以帝王建制重修为陵。因此，西夏陵区的始建年代当定为公元1038年。尔后，西夏诸帝除末主现为元人虏杀外，余者均葬于贺兰山下，其墓号：太祖李继迁^⑥（赵保吉）裕陵；太宗赵德明^⑦嘉陵；景宗元昊（曩霄）^⑧泰陵；毅宗谅祚安陵；惠宗秉常献陵；崇宗乾顺显陵；仁宗仁孝寿陵；桓宗纯佑庄陵；襄宗安全康陵；神宗遵项（失号）；献宗德旺（失号）。

明代管律等编纂的《嘉靖宁夏新志》卷二云：“贺兰山之东数塚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诚然，中国自秦汉以来，已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帝王埋葬制度。西夏从嵬名元昊称帝建国之后，“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⑨因而在埋葬制度上也必然要受到中原封建王朝的影响。但是，西夏毕竟是由党项民族为

主体建立的政权，其历朝帝王又均属党项族人，故其埋葬制度与中原王朝绝不可能雷同，陵园的设计与建造，也必然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

一 皇陵与陪葬墓的分布

绵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部的贺兰山脉，南北走向，长五百余里。远瞩似骏马静卧，近视峰峦重叠，挺拔苍秀。群峰之间，清泉潺缓，松柏青碧。明代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有诗赞曰：“贺兰之山五百里，极目长云高插天。断峰迤迤烟云阔，古塞微茫紫翠连。”^⑩ 西夏陵区就在这山巅岗阜之下，南迄三关口，北至泉齐沟。陵区之东，为西夏建国初年开凿的著名渠道——“昊王渠”。这里坡高地阔，居高临下俯视图整个银川平原，极目远瞩又可以看到波涛汹涌的黄河，正是当时地理家所谓的“上吉之地”^⑪。

这里所以能被西夏帝王择为陵园之地，不仅因其地势优越，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西夏都城的确定。宋天圣元年（1023年），党项首领赵德明“城怀远镇为兴州以居”^⑫，实为定都兴州之前奏。宋明道二年（1033年），元昊“升兴州为府，改名兴庆，广宫城，营殿宇，其名号悉仿中国所称”^⑬，正式确定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为都城。西夏陵园的修造则是在定都兴庆以后开始的。

据调查，西夏陵区现存帝陵九座，陪葬墓七十余座，陵邑遗址一处，还有专为陵区烧制建筑材料的砖瓦窑址和石灰窑址数十座。它们分布在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5公里，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构成一个完整的陵区建筑群体。

西夏陵区帝陵的排列是颇有规律的。但是，由于目前对帝陵碑亭遗址只发掘了三处，要确定各帝陵的准确位置，还缺乏必要的文字资料，尚需继续对其余各帝陵的碑亭遗址进行发掘^⑭。然而，根据现已确知墓主人的两座帝陵的相对位置，及其它有关资料，可以肯定帝陵是由南向北依时代先后排列的。从平面上又可看出分为两组，一组为平原起冢，；另一组依山起冢，各自为行。为调查和叙述方便起见，我们将各陵做了编号。编号M₁—6的陵墓为第一行；M₇—9的陵墓为第二行^⑮。位于陵区南端，平原起冢的M₁、M₂号陵时代最早，两座陵相距又很近，可能即元昊称帝后，按帝制为其祖、其父重修的裕、嘉二陵。此二陵之后（向北）于平原起冢的M₃—6号陵递次渐晚^⑯。依山起冢的三座陵，时代上要晚于平原起冢的诸陵，可能为安全之康陵、遵项陵和德旺陵。

为什么会出现帝陵分东、西两行排列呢？自然不是地形选择上的原因，当与夏国政权内帝王的承袭、传位有关。在西夏历史上，从元昊至纯佑，相传六代，均属父子相承。

而到了纯佑在位之时，即夏天庆三年（1196年）十二月，越王嵬名仁友卒，其子嵬名安全上表宣耀先世之功，欲袭越王爵。纯佑不许，封为镇夷郡王。安全极为不满，遂于天庆十三年（1206年）与纯佑母罗氏合谋，“废其主纯佑自立。”^⑩安全乃崇宗乾顺之孙，仁宗仁孝之侄，与纯佑互为叔伯兄弟，其陵墓自然不肯排列在纯佑的陵墓之后。

陪葬墓是西夏皇亲贵臣的墓葬，分布于各帝陵的周围。每座帝陵的陪葬墓多寡不等，多者十余座；少者两、三座。陪葬墓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形制上都与帝陵有显著的差别^⑪。从而反映出西夏的埋葬制度同样具有严格的封建等级观念。

在陵区的北部，有陵邑遗址一处，为长方形庭院式殿宇建筑，面积约十万余平方米，当为护陵者及僧侣等人的居处和祭祀活动的场所。

陵区东部，沿“昊王渠”两岸，分布了砖瓦窑和石灰窑数十座，这些窑的形制与中原地区所常见的同类窑址基本上相同^⑫。从而说明了西夏陵区所使用的大量建筑材料，是就地取材，就地烧制的。

西夏陵区皇陵与陪葬墓，以及其它有关建筑遗址的分布，同中原地区的唐、宋皇陵相比较，在总体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以下几点显著的差异：

（一）西夏陵园的范围较唐、宋皇陵要小。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鼎盛时期，其埋葬制度又无所谓“七月之期”^⑬的限制，皇帝即位之日，就可以开始修造陵墓，故陵园规模宏大，一陵几乎占地一县^⑭。宋代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限于埋葬制度，因而陵区面积和陵园的规模较唐陵显著缩小。然宋陵虽集于一县，但比起西夏陵区依然要大得多^⑮。

（二）宋陵于皇陵之后有祔葬后陵及下宫等建筑。西夏皇陵较为单纯，无论是皇陵之后还是兆城内均无后陵，亦无下宫等附带建筑。而且从地面现存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后陵可能与帝陵同穴。

（三）宋代阴阳堪舆之术极甚，丧葬凶吉皆依五音，即先按姓属分五音（宫、商、角、徵、羽），五音择地各不相同。宋皇室为赵姓，《地理新书》卷十“五姓所属”条列赵姓为角音。又有角音贯鱼葬之法^⑯，故宋陵在同一兆城内之陪葬墓的排列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西夏虽受中原阴阳堪舆之术的影响，但其皇姓“嵬名”，葬法不可能与宋陵相同。西夏陵区的陪葬墓多不在兆城之内，也没有明显的排列规律。

（四）西夏陵区的陵邑位置选择在陵区的北部，因而可以推测它的始建年代大约是在西夏中期以后。陵邑本身的占地面积不大，因为它不同于唐、宋时代的陵邑皆带有行政区划的性质^⑰。西夏主管修陵、安葬和祭礼等活动的机构称为“红漆羸毚”，汉意为：“圣莹地居”^⑱，属中等司，其职权范围可能与宋山陵使相当。

二 帝陵的地面布局与墓室结构

西夏皇陵基本上座北向南，从南至北由鹊台、碑亭、月城、内城以及角台等各部分组成，而以鹊台和角台作为兆域范围之标界。每座陵园占地面积约十余万平方米。

鹊台（亦称阙台）一对，对称座落在陵园的最南端，实为陵园的兆门，这与唐、宋陵园立阙为门是一样的。黄土夯筑，方形，底大顶小，外包砖灰，台顶建有阙楼。

鹊台之北为碑亭，各陵所建碑亭数目两座、三座不等。凡两座者，东、西各一座，三座者，为两座位东，一座位西。碑亭的台基略呈正方形。但是，即使是同一陵园的碑亭，其面积和建筑形式亦不相同（后文专论）。碑亭的台基面上铺有方形砖并立有石碑（今已残碎），碑文以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撰刻。

碑亭北面为月城，呈长方形，南墙正中辟门，门道两侧比墙身加宽。东、西两墙与内城南墙相接，北墙与内墙之南墙合为一墙。月城内御道两侧各置两列或三列文臣武士石像。

内城位于陵园的北部，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环内神墙，墙体黄土夯筑，底宽上窄，外部贴有残砖，然后再用石灰墙皮包裹，石灰面涂朱色。四面神墙均正中辟门，并建有门阙。但有些陵园内城仅南门畅通，东、西、北三面虽有门阙，然在门道内以土坯砌成数米高的台阶，无通行之意。在内神墙的四个转角处，墙体加宽，上部建有角阙。内城为陵园的主体建筑，占地面积超过整个陵园的一半。内城之中，建有献殿、陵台等建筑。陵台之东南向为墓道，墓道填土隆起高一两米，形状如鱼脊背，这种情况在中国历代陵园中是极少见的。陵台与墓道位于内城西北方，其墓穴择于丙穴地，反映了西夏统治阶级同样受到北宋时期阴阳家的影响^②。

月城与内城以外有外神墙，早期陵园的外神墙与角台接近，城垣较高，晚期陵园则外神墙内收，仅有东、西、北三面，并以未经加工的自然石料筑一道不宽的墙基，城垣已不明显。

西夏陵园的地面布局，与唐、宋陵园大体相同。但是，它在布局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这就是，它不同于中原帝陵从鹊台至神门之间有漫长的御道，而是将石像生群安置在月城内御道的两旁，从而缩短了陵园前后间的距离，使整座陵园的平面布局显得比唐、宋陵园更加紧凑。这种布局使西夏陵园增加了月城建筑，而在宋陵和唐陵中都是没有月城的。

墓室（即所谓地宫）的形制与唐、宋皇陵基本相同。它也是由甬道、中室及左右耳室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其墓室不作砖室，而于墓室四壁立护墙板^③。中国自进入

封建社会以来，始于秦汉时期的砖室墓，经魏晋、隋唐五代至北宋，不仅流行广泛，而且营造技术已发展到娴熟的水平。迄今发现的宋代墓葬，绝大多数为土洞内作砖室。有些宋墓，特别是大、中型墓的砖石仿木结构，几乎能与当时的木构建筑相媲美²⁹。近年在甘肃省武威地区发现的西夏墓内，墓主人为汉族，其墓室同样作砖室墓³⁰。由此说明，西夏帝陵的墓室作土洞而不修砖室，除经济上和埋葬期限等方面的原因外，当与党项民族的生活习俗有关。地下的墓室是地上居室的反映。党项族历来就有“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犛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³¹的习俗。既使到了夏国建立之初，依然“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³²可见，至少在建国以前和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土屋在西夏境内，为党项民族主要的居住建筑。虽然西夏的帝王是不可能以土屋为居室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帝陵墓室的土洞结构中，看到党项民族传统的生活习俗。

三 陵园地面建筑的独特风格

西夏时期规模宏伟的建筑见于史书记载的不少，从现存史料中可知，早在西夏建国之前，党项首领赵德明即“大役民夫数万，于辍子山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³³元昊称帝后，于兴庆府“城内作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³⁴”；于贺兰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³⁵现存甘肃武威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上也记载了西夏当时重修的护国寺“金碧相间，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名状。”³⁶然而，这些宏伟壮丽的西夏建筑，历经数百年战乱和大自然的冲击，已荡然无存。始建于西夏时期而保存至今的较完整的建筑，仅有两处，即矗立于今宁夏银川市的承天寺塔和座落在今甘肃省张掖县的大佛寺。但是，这两座建筑又都经后代屡次重修，并非当时实物。因此，保存至今的西夏陵园的地面建筑和遗址，是研究西夏建筑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夏陵园的地面建筑，如前所述，就总体而言，无疑受到中原地区汉族建筑的巨大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剖析一下其中的一些个体建筑，就不难发现，西夏陵园建筑更富有自身的民族特色。

（一）陵台

陵台是陵园中的主体建筑之一。在中国古代陵园建筑中，陵台一般为土塚，起封土作用。即墓室之上，或堆土如山；或依山掘塚；或夯一方形或圆形土台，再用砖或石灰面加以包裹。但是，西夏皇陵的陵台建筑却别具一格。

首先，其陵台的位置设在墓室垂直线后部约10余米处，因而实际上根本不具封土

塚的作用。这种情况，在中原地区的唐、宋陵园中是没有的。

其次，西夏陵台以夯土筑成平面呈正八边形的高台，从下至上分作七层，逐级内收，每层收分处为出檐木结构，并挂有瓦当、滴水、屋脊兽等建筑材料，夯土台外部则砌砖包裹。陵园未破坏前，其陵台无疑是一座密檐式的七层实心高塔建筑。陵台建以塔形，这在中国陵园建筑中是极特殊的。

塔是佛教的建筑物，其本义就是坟，是埋葬佛骨的坟墓。西夏陵园修造塔形陵台，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崇奉佛教的宗教意识。西夏正式建国前后多次向宋朝求赐佛经^⑳，元昊本人就“晓浮图学”^㉑。西夏统治阶级还驱使境内各族人民广建寺院，修造佛塔。据《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述，西夏“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㉒仅兴庆府城内外，除原有的“黑宝塔寺”^㉓“戒坛寺”^㉔等佛教寺院外，元昊时期曾在兴庆府东建高台寺，谅祚时期又在兴庆府西建承天寺^㉕。从西夏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刊刻西夏文和汉文佛经的记载^㉖。

（二）碑亭

碑亭是西夏陵墓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后人用来为自己的先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地方。其建筑结构和布局具有下述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西夏陵区每座帝陵一般为两座或三座碑亭。它们的位置不同于唐陵和宋陵，而是设在鹊台之后，月城（包括石像生群）之前。而多数帝陵为三座碑亭，即西边一座，东边两座。这样的布局从局部来看是极不协调的。但是，如果纵观陵园的全局，就不难发现，由于西夏陵园的陵台和墓道位置都避开了子午线，而偏于南北中轴线以西，所以东、西碑亭数目的不等，反倒使整个陵园的布局避免了“西重东轻”的缺陷。

第二，在各帝陵中的碑亭，无论是两座或三座，其建筑面积各不相同。有两座碑亭的帝陵，一般来讲都是东碑亭大于西碑亭，而有三座碑亭的帝陵，则在东边的两座碑亭中，位南的一座碑亭建筑面积最小。这些碑亭的建筑面积互相间相差很大，可能是随立碑人的身分、地位不同而异，但就建筑本身而言，显然是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对称格局。

第三，在同一陵园中的各碑亭，建筑形式截然不同。以现已发掘的八号陵园为例，八号陵共有东、西两座碑亭，它们的台基虽均呈正方形，但东碑亭的台基高于西碑亭。西碑亭的台基面上除发现有扁平的自然石块作柱础外，还堆积了大量的砖、瓦和鸱吻等大型装饰性建筑材料，在台基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砖砌的斜坡踏步。这些迹象表明，它可能是一座穿堂式的殿宇建筑。东碑亭则完全不同，在它的台基面上无一块柱础，仅用方砖铺成圆形地面，周围虽堆积有大量的残砖和整长条砖，却不见片瓦，台

基西侧有一砖砌的阶梯踏步。这些迹象表明，它可能是一座穹隆顶的圆形建筑。这种建筑形式就如同我们在西北黄土高原上至今还可以看到的窑洞。

此外，碑亭内所树的墓碑都是以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刻成，它们同西夏陵园具有民族特色的碑亭建筑相配，更增添了浓厚的民族色彩。

（三）角台

角台是西夏陵园中独特的建筑。每一陵园均有四座角台，其位置建在陵园兆域之外围。后部的两座角台，位于陵园的尽北端，前部的两座角台其南端基本上不超过碑亭所在的位置。早期陵园的角台与外神墙比较接近；中、晚期陵园由于外神墙逐渐内收，角台则成了兆域东、西、北三面的唯一标界。从角台四周堆积的残砖碎瓦等物可以肯定，角台之上原建有阙楼，但周围没有登高的阶梯，它同鹊台上的楼阙一样，似乎仅起装饰作用，并不实用。而在唐、宋陵园中，只有建筑在神墙四周转角处之上的角阙，而没有类似西夏陵园中的自成一体的角台建筑，西夏陵园中以角台为兆域的标界，那更是中国陵园建筑中绝无仅有之事。

综上所述，西夏的陵园建筑吸收了我国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时期陵园建筑之所长，同时又受到了佛教建筑的巨大影响，使汉族文化、佛教文化和党项族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建筑形式。透过西夏的陵园建筑，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西夏建筑之一斑。它不仅为我们研究西夏时期的建筑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建筑史增添了别开生面的重要一页。

注 释

- ① 安塞王禘齐：《古塚谣》，见《嘉靖宁夏新志》卷七。
- ②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八。
- ③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
- ④ 《西夏书事》卷十一。
- ⑤ 《西夏书事》卷十二。
- ⑥ 李继迁，本唐赐“李”姓，宋赐姓名赵保吉。
- ⑦ 宋赐“赵”姓。
- ⑧ 元昊立国，改姓“嵬名”，后又更名“曩霄”。其后诸帝中有的又复姓李。故一般以李为其姓。
-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
- ⑩ 金幼孜：《出郊观猎至贺兰山》，见《嘉靖宁夏新志》卷七。
- ⑪ 王洙等：《地理新书》卷二地形凶吉条：“后有走马岗，前有饮马塘，冈阜形势，小顿大起，延连百里不断者，为上吉。”转引自宿白：《白沙宋墓》注八。
- ⑫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
- ⑬ 戴锡章：《西夏纪》卷六。
- ⑭ 西夏皇陵各有墓号，但史书未明确记载各陵的相对位置。近年从陵前碑亭遗址发掘出土的残碑碑文上，可以见到一些与陵墓时代或墓号有关的资料。其中有直接材料确定墓号者，仅有寿陵。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一文（载《文物》1978年第8期），以间接材料推断该陵的墓主人为西夏第八代皇帝嵬名遵项。

- ⑮ 197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钟侃等同志开始在陵区调查时，曾对皇陵及规模较大的一些陪葬墓做过一次编号，这次编号按调查的先后顺序，从北向南确定号数。著者后来在进一步调查时，将西夏陵区的皇陵与陪葬墓分开，重新进行了编号。其中皇陵的编号依时代先后，用一位或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数前冠以“M”符号。本文和本册图录中所使用的编号，均为新编号。
- ⑯ 如果假定M 3为夏景宗嵬名元昊之泰陵，那么从M 3至M 5（寿陵）中间至少应有三座帝陵，即安陵，献陵和显陵，但是根据目前实地调查的结果，在M 3到M 5中间仅有帝陵一座。原因何在呢？据反映，六十年代初，某单位在这一地区修建工程时，平掉了不少墓冢、台阙和墙垣，由于这项工程开始施工是在西夏陵区调查工作进行之前，因此其中是否有帝陵也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从现存的帝陵数来看，平掉的墓冢中很可能包括两座帝陵在内。
- ⑰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
- ⑱ 在西夏陵区里，除个别陪葬墓规模较大外，绝大多数的陪葬墓规模都比帝陵小得多。在形制上，陪葬墓没有帝陵所必须具有的鹤台、角台、献殿等个体建筑，墓冢的形状也与帝陵有别。此外在城垣石灰墙面的颜色和建筑材料的使用上，都有明显的不同。
- ⑲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银川缸瓷井西夏窑址》，载《文物》1978年第8期。
- ⑳ 所谓“七月之期”乃宋代的埋葬制度。宋朝规定，在皇帝死后方可动工修陵，七个月之内竣工下葬，超过七个月者为不吉。
- ㉑ 参阅陕西省文管会：《唐乾陵勘查记》，载《文物》1960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查记》，载《文物》1964年第1期；陕西省文管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载《文物》1965年第7期；陕西省文管会：《唐桥陵调查简报》，载《文物》1966年第1期。
- ㉒ 参阅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载《考古》1964年第11期。
- ㉓ 参阅宿白：《白沙宋墓》注一六八——一七七。
- ㉔ 陵邑的设置始于汉代。唐在昭陵设醴泉县，在乾陵设乾县，分管各陵。宋代陵园集中，便改永安镇为县，兼管诸陵。唐宋陵邑皆并于县级行政机构。
- ㉕ 见(苏)克恰诺夫：《有关西夏政权机构的西夏史料》，载苏联1965年《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69册。
- ㉖ 我国阴阳学说渊源甚远，《旧唐书》卷七十九《吕才传》中记载：“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宋人更迷信阴阳堪舆之说，司马光于元丰七年（1084年）正月撰《葬论》一篇，其云：“今人葬不厚于古，而于阴阳禁忌则甚焉。”又：“今之葬书乃相山川冈赋之势，考岁月日时之支干，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夭、贤愚皆系焉，非此地非此时不可葬也。”西夏的埋葬制度显然也受到当时的阴阳学说影响。
- ㉗ 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载《文物》1978年第8期。
- ㉘ 见宿白：《白沙宋墓》第一、二、三号墓。
- ㉙ 见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 ㉚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党项羌传》。
- ㉛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
- ㉜ 《西夏书事》卷九。
- ㉝ 《西夏纪》卷十一。
- ㉞ 《西夏书事》卷十八。
- ㉟ 张维：《陇右金石录》卷四。
- ㊱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〇九；卷一百十五。
- ㊲ 曾巩：《隆平集》卷二十。
- ㊳ 张维：《陇右金石录》卷四。
- ㊴ 乾隆年间所修《宁夏府志》录闽浙总督赵宏燮于康熙年间所撰《重修海宝塔记》云：该塔“惟相传赫连勃勃曾为重修，遂有讹为赫宝塔者。”“黑宝塔”之称见于明代宁夏地方志。清重修后则称“海宝塔”。西夏时该塔寺名称不详。此处暂借明代之称。
- ㊵ 《西夏书事》卷十八：夏天授礼法延祚八年（1046年）八月，元昊“得没藏氏于三香家，迎养宫中，已与之私，野利氏觉之，不忍杀，使出为尼，号设藏大师，居于兴州戒坛寺。”可见该寺在西夏初年即有之，但始建年代不详。
- ㊶ 《西夏书事》卷十八。
- ㊷ 《西夏纪》卷十八。
- ㊸ 周叔迦：《馆藏西夏文佛经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 (苏)哥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与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出版。

略论西夏壁画艺术

刘 玉 权

西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一个成员，曾有声有色地活跃在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对古代西北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可是，从公元1227年被蒙古征服后，便渐渐地消声匿迹了。到本世纪之前，人们对西夏的历史和文化尚知之甚少；至于西夏的壁画艺术，更是无从说起。二十世纪初叶，沙俄奥勃鲁切夫与科兹洛夫以及英国斯坦因等人，相继潜入黑城，劫走了大量西夏文物。其中即包括不少珍贵的西夏艺术品，也有壁画。

解放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不少西夏壁画艺术品。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首次将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初步鉴定出来的几个西夏洞窟中的壁画艺术向读者作了介绍^①。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的“西夏工作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群中的西夏洞窟进行了专门调查。西夏工作组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宿白先生的帮助下，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在莫高窟划分出七十七个、在榆林窟划分出十一个西夏洞窟^②。上述工作为了解认识以及研究西夏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在此前后，内蒙古、宁夏及甘肃等地，或寺庙壁画，或墓室壁画，或石窟壁画，也陆续有所发现^③。198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同安西县有关部门又在甘肃安西县桥子乡东南35公里处的峡谷中，发现一座石窟寺，名叫“东千佛洞”。其中鉴定出西夏洞窟三个，又为研究西夏壁画艺术提供了新资料^④。遗憾的是这些西夏壁画为数过少，零碎不全。相比之下，唯有敦煌莫高窟与安西榆林窟现存这批西夏壁画，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时代涉及西夏历史的早、中、晚各个时期，相当完整系统。毫无疑问，这两座石窟是我国保存西夏壁画艺术最多的地方。

由于上述原因，本文原则上就是以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西夏壁画艺术为讨论重点。最近新发现的安西东千佛洞西夏壁画艺术，因笔者尚未作实地考察，不敢妄加评述，只是在某些方面偶有涉及而已。。